

On 21st Century

Japan's Foreign Strategy Research

21世纪 日本对外战略研究

张卫娣 肖传国◎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21 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

张卫娣 肖传国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张卫娣,肖传国著. —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80237-517-8

I. ①2… II. ①张… ②肖… III. ①对外政策—研究
—日本—21 世纪 IV. ①D8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6400 号

书 名: 21 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

著 者: 张卫娣 肖传国

责任编辑: 潘 宏

封面设计: 冬 子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7-517-8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A5

印 张: 9.25

字 数: 25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1 ~ 2600 册

定 价: 28.00 元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储运部联系(010-66767383)

导 论

一、研究的意义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关系中隐藏在美苏意识形态对立下的矛盾纷纷表面化,围绕能源争端、文化冲突、恐怖袭击、环境问题等因素所引发的问题致使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多变。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日本外交理念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以“与强者为伍”为信条的现实主义手法的统一。

中国崛起后,将发生从“日本优势”到“中日对等”,再到“中国优势”的结构型变化,日本将面对在东亚两大国并立的时代之后中国优势的到来。这一变化将不仅影响到中日关系,甚至日美关系、亚太地区的整体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中国的崛起,是改变世界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带来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权力的变更,这种变化和变更直接涉及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新排列。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增强,这些变化必然导致各个大国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崛起的加速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使东亚的大国关系面临着全面调整。这次调整使中日之间潜在的许多矛盾凸显,呈现结构性特征,形成结构性矛盾。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甚至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日本看待中国的目光和心理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心态复杂,对中国的崛起是又急又恨又怕。因此,日本必然会将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对手,从战略上制衡中国的崛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经过了一系列曲折的发

展变化。尤其是小泉政府上台以来,两国间相继爆发了“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钓鱼岛”、“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中日关系进入了两国建交以来的低谷期。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今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必然引起世界的关注。因而,研究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对于全面正确理解及处理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很有市场,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巨大障碍。正确认识“中国威胁论”,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对于中日关系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走向政治大国,是日本国力增大导致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进程。日本究竟将走向何种政治大国?是否会走向军事大国?这不仅事关日本自身的未来命运,而且将给亚太国际关系带来直接影响。回顾日本国家战略的历史,研究其现状,展望其未来,了解其发展轨迹,对于我们制定对日政策将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在理论诠释的基础上,以新资料、新数据为佐证,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为我今后制定政策和措施提供借鉴参考。

二、基本内容

本书正文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对21世纪初日本外交理念的演变及其特点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对日本对外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了挖掘;第三章对日本的对华战略进行了探讨,最后对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转变的动因进行了剖析。

1. 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不断变换外交理念。小泉执政时期,日本一直采取对美依存的外交战略,导致被亚洲各国边缘化。2006年,自民党“鹰”派代表人物安倍晋三接替小泉出任首相后,倡导建立“自由繁荣之弧”,开展价值观外交战略。2007年,自民党“鸽”派代表福田康夫出任首相后,开展强化日美同盟与推进亚洲外交并举的“共鸣外交”战略。2008年,麻生太郎出任首相后,基本否定了2006年任外务大臣时提出的、旨在意识形态上构筑对华包围圈的

“自由繁荣之弧”战略,打出“欧亚十字路口构想”战略,开始了从“西方的一员”到“亚洲的一员”的国家身份认同的转变。2009年民主党执政后,鸠山由纪夫提出了“自立与共生”的外交理念,提倡“友爱外交”,否定了“价值观外交”。接替鸠山的菅直人政权,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鸠山的对外战略,重视同亚洲各国的关系,试图在亚洲外交和日美同盟的权衡中寻求独立性,但他抛弃了鸠山的理想主义外交战略,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现实主义战略,致力于日美关系的修复。

小泉政权后的日本外交理念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从对美一边倒开始强调自主外交。二是由于亚洲地位的提升,又重回亚洲,重视亚洲外交。三是由于经济、地缘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日本逐渐缓和对华关系。四是冷战思维逐渐弱化。

2. 日本一直致力于“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自20世纪80年代确立“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后,日本为此孜孜以求。其主要途径为海洋战略、情报战略、日美同盟和“价值观外交”等。

对外战略的实施路径之一是“海洋战略”。海洋战略是日本国家战略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大国化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逐步强化日美同盟,通过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努力,最终从岛国转变为海洋国家,从曾经的“资源贫乏、人口过密、地域狭小的国家”发展为“拥有先进技术经济大国”、“贸易国家”,完成了国家形象的转变。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开始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动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变,确定了“海洋立国”的海洋战略,从海洋立法、机构设置、加强军备、强化日美同盟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努力,并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进入21世纪后,在舆论的推动下,日本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追求逐渐深入人心,制定综合海洋战略的时机终于成熟。日本政府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制下制定了以实现海洋综合管理、可持续性海洋开发利用、海上航线的安全保障等综合海洋战略,它是包括涉海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一个庞大的集合。在海洋外交方面,逐步加强对美合作,且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加强与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谋求构建西太平洋国家同盟等海洋国

家联盟组织,参与制定和维持海洋新秩序,并力争成为“太平洋统一体的领导者”。日本在推进海洋战略的过程中,尤其是为了确保海上航线的安全,十分重视海上军事力量。日本强调,“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正朝不安定的方向发展”,因此为了应对新的安全威胁,应对多样事态,准备抵抗来自海上的军事侵略,保护日本的海洋权益,必须建成一支强有力的、高机动性的海上军事力量。

海洋战略在日本的大国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主要战略意图如下:积极推进海洋扩张,以改变资源贫乏的现状;广泛开展海洋外交,以实现政治大国梦想;实行牵制政策,抑制中国向海洋发展;与周边国家争夺海洋权益。

对外战略的实施路径之二是情报大国战略。随着大国野心的膨胀,日本今后势必继续深化情报领域改革。从近年来日本一系列的情报改革不难发现,为了解决其“大国战略”和“情报小国”间的矛盾,日本正试图通过改革,谋求构筑其情报大国的地位,进而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冷战结束后,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日本对情报机构和情报工作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谋求从小国的经济情报向大国的全方位情报转变,重视对外情报特别是对外政治和军事情报的收集,加强对中国、朝鲜等重点地区的情报活动,同时积极推进与同盟国的情报合作和交流。二是从“以美国为依托”的战略情报体系向建立独立自主的情报体系转变,并力求推进与美国的信息共享。三是创立中央情报机构,构筑“官邸主导型”的情报体制。

为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通过制定应急情报法案,加强情报收集手段多样化和完善组建中央情报机构的立法等多种渠道,不断制定和完善与情报相关的法案和政策,全力推进情报体制的改革。二是整備情报体制:健全情报收集体制;完善情报保密体制;整備日美情报合作体制。三是提高情报装备的科技水平。在深化情报体制改革的同时,日本积极研发和购进最先进的技术设备,通过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构筑起了集宇宙、太空、地面、海上为一体的情报侦察网络系统,以提高情报收集的效率。

对外战略的实施路径之三是日美同盟。二战后至今,日本一直实施“脱亚入美”战略,将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在亚太地区共谋主导权作为对外战略的“基轴”。21世纪初,日美同盟开始从防御性威慑型向进攻型转化,日本已从单方面受美国保护转向对美军作战提供后勤支援,军事行动范围扩大到印度洋和中东地区。特别是2005年2月日美安全磋商会议后发表的共同声明,第一次明确地将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台湾问题列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这种清晰化的转向,表明日美安保体制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重新定义后的日美安保体制使日本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其在战略安全上的主动色彩大为增强,从受保护的小兄弟角色上升为与美国联手演戏的平等伙伴,也就意味着日本在日美安保体制中的职能已由“专守防卫”转变为“联手出击”。它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将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并将充当美国谋求亚洲乃至世界霸主的重要助手。第二,防卫合作范围扩大。冷战时期,日美安保体制的防卫范围除日本本土外,仅限于“远东地区”。关于“远东”的范围,前面已经讲到,是指“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围地域,包括韩国、台湾地域在内”,重新定义后的日美安保体制的防卫合作范围则扩大到了概念模糊的“日本周边地区”。第三,防卫合作的内容增加。原体制日本的防卫政策一向被称为是“专守防卫”。但新体制却规定日本自卫队的作用要从“专守防卫”扩展到参与美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其具体体现就是日美军事一体化。为了能够顺利地实施旨在共同保卫日本的联合作战,促进两军在战术方面的协调沟通,提高两军一体化作战能力,日美两国不断加强联合军事演习的频率,提高军事演习的档次,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出现了突出实战性、针对性、进攻性和多样性等新动向。因此,21世纪初的日美同盟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日美同盟的动力由“单轮驱动型”向“双轮驱动型”转变。第二,日美同盟的定位由“双边防御型”向“区域主导型”转变。第三,日美同盟的分工由“美主日从型”向“美日一体型”转变。第四,防卫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冷战时期,日美安保体制的主要防范对象是苏联,现在则转变为以中国和

朝鲜为主。

对外战略的实施路径之四是“价值观外交”战略。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体现了其强烈的地缘战略意识。从“自由与繁荣之弧”这一理念可以看出,日本希望把欧亚大陆周围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价值观外交”的重点对象。价值观外交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一种政治手段,有其对内、对外的战略考量。对内,可以通过渲染威胁情绪,提高国民的“危机意识”。美国社会学者路易斯·科塞尔曾指出,敌对集团(威胁)的存在或与其他集团抗争可以强化社会集团成员对本集团的归属意识,使其与周围社会集团的区别更加鲜明。也就是说,通过渲染来自共同对立势力的敌对感情,可以加强某一集团内部成员的团结。因此,日本时常强调周边地区存在与本国文化特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借此来提高“国民的凝聚力”,统一国民意识,实现大国化的梦想。对外,可以从意识形态上构筑遏制中国的C形包围圈。

日本对外战略的根本归宿是“政治大国”。谋求成为政治大国这一基本国家战略,是日本经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终极目标是早日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其实施路径是:第一,亚洲是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战略基地,因此,日本以亚洲外交为出发点,力争首先成为亚洲盟主。第二,以日美关系为基点,着力开展“大国外交”。首先,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建立日美“新型伙伴关系”。加强对美外交、保持稳定的日美关系,始终是日本外交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其次,由于在日本为谋求政治大国而开展的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中,中国处于重要地位,因此,逐步转变对华政策,重新定位中日关系。再次,调整对俄政策。努力争取俄罗斯对它实现这一目标的支持与合作。另外,拓展对欧影响,加强三极架构。“同美欧平起平坐、建立日美欧三极主导的新秩序”,是日本描绘的政治大国蓝图的一部分。面对日美欧三边关系中日欧关系最为薄弱的状况,日本认为,只有大力发展日欧关系,才能加强三极架构并在其中取得主动,从而实现同美欧平起平坐的目标。第三,以联合国外交为重点,极力增强国际影响力。第

四,调整军事战略,抛弃“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理论方针,提出了“地域性安全”、“全球性安全”等新的理论。第五,在文化战略方面,向世界推行“文化输出”战略,从思想上、心理上为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3. 日本对华战略的王牌之一就是大肆鼓噪“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持续多年的“日强中弱”的不对称格局,使东亚第一次出现两个强国并立的态势。这种态势加剧了日本对中国战略意图焦虑的现实主义关注,担心“华夷秩序”将在东亚恢复。这也是日本“中国威胁论”盛行的重要根源。但是,“中国威胁论”不单纯是因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提升、军事现代化加快的正常心理反应,它反映了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周边心态、等级观念和“町人根性”等心理习惯思维。大肆鼓噪“中国威胁论”是日本保守主义、机会主义、依赖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综合体现,是日本对华战略的一张即时王牌,既有国内用心,也有对外图谋。日本从战略高度炮制了“中国威胁论”,其主要目的是遏制和牵制中国,推动大国战略的实施。具体来说,其主要措施:一是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力,力争成为亚洲盟主;二是修改宪法,解除现行宪法对日本军事发展的制约,调整防卫战略,加强军事力量;三是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日本鼓噪“中国威胁论”,具有很大的危害。第一,破坏中日之间的情感基础,加深两国间的历史积怨和感情隔阂。第二,导致中日两国政治互信缺失,战略误解加深。第三,影响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第四,影响中日在东亚地区的合作。

冷战结束后,日本将对华战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即,通过日美同盟“外溢化”、安全机制“多元化”,深化构筑安全战略;通过东亚区域“扩大化”、敏感问题“国际化”,积极开展多边外交;通过文化实力“强势化”、价值外交“弱体化”,大力推动国家建构。

特别是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战略调整的趋势更趋明显。主要表现在:防卫理念从“基础防卫”转向“机动防卫”;联合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周边国家,全面牵制中国;防卫重点转向西南诸岛,重点加强岛屿争夺,确保西南战略前沿;强化岛链封锁,完善日

美对华封堵战略。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之间潜在的许多矛盾日益凸显,呈现结构性矛盾。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对华将采取统合、平衡、遏制等安全战略。即,运用统合战略,与中国展开合作,以期国际体系与中日关系的稳定;运用平衡战略,努力使不断增长的中国影响力不要妨碍到地域及全球合作;运用遏制战略,防止中国影响力的迅猛增长。这三者的作用是不同的:“统合”“平衡”是手段;“遏制”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其终极战略目标就是抵制中国崛起。

4.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的这些转变,不单是党派理念或政治家个人执政理念不同的结果,而是世界局势和日本国内形势变动所引发的必然联动效应。从建构主义的理论来看,主要是日本国家认同的变化。小泉政权后,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下,日本以政治大国为目标,面临经济恢复和独立性追求两大课题。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日本转变国家认同,走“回归亚洲”道路,开展作为“亚洲一员”的外交。第一,加强与既有欧美国家集团的合作,同时推进同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作为“亚洲一员”积极开展外交。小泉时期,将日本定位为有共同价值观的西方一员,采取对美一边倒战略,结果被亚洲各国边缘化。小泉政权后,身为亚洲区域内国家的日本,开始回归亚洲,积极改善同中韩等亚洲各国的关系,作为“亚洲一员”积极开展外交,推进各领域的合作。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给日本经济以强有力的支持。第二,试图成为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开展广泛外交。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追求本国独立性,选择成为两个国家集团桥梁的战略。具体来说,就是成为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致力于解决全球变暖、核扩散问题等全球性课题,作为多文明间桥梁积极发挥作用。第三,提出构筑新国家集合东亚共同体,谋取东亚领导地位。这是日本为了在多极化国际秩序中为寻求安定的国家认同,组建使自己归属的国家集团。小泉政权后,日本不断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形成,积极强化同亚洲各国的合作,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谋求新国家集团——东亚共同体的领导地位。

三、研究方法

第一,本书始终贯彻一个中心、两种意识:一个中心是以日本的对外战略(包含外交理念和政策)为中心;两种意识是转变意识和中国意识,即始终关注日本外交理念的转变及其动因,始终将日本对外战略与中国的关联作为重点,探究日本对外战略对我国的影响。

第二,注意政治因素与非政治因素的互动关系,采取新兴学科探讨与典型问题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文化与战略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罗荣渠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文化的作用“始终限定在一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国际环境中”,坚持“文化因素的探讨必须与制度因素首先是政治因素结合起来考察”。他指出:“过去探讨文化动向只在文化层面打转转,不接触经济层面,最后就会回到把中国出路问题归结为一个文化问题的思路上来。为了避免这种泛泛议论,探讨文化问题的重点应放在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时代的课题上,即文化因素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的问题。”^①本研究将“文化政治学”视为一门新兴学科,探讨文化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

第三,运用“实力转换”理论,探究中国崛起与日本对外战略的内在关联。罗伯特·A.帕斯特指出,凡是出现一个新的强国总是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因为它不仅向政治和战略的现状发出挑战,而且可能造成紧张的经济冲突。

第四,以日本的对外战略为切入点,以对外战略与安全战略、政治战略的互动关系为主线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践探究,对日本国家战略的演进规律和历史逻辑性进行剖析。

第五,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对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转变的动因进行剖析。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虽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国家身份;国际体系结构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核心内容是观念分配(体系文化),而不是物质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227~2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实力的分配。建构主义是体系理论,体系文化是其主要构成因素,体系文化构成了国家身份,国家身份建构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行为。国家行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则表现为国家的对外政策。

另外,采用历时分析与共时分析相结合、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解析。

目 录

导 论

一、研究的意义	(1)
二、基本内容	(2)
三、研究方法	(9)

第一章 21 世纪初日本对外战略的变奏

第一节 21 世纪初日本对外战略的彷徨	(3)
一、小泉时期的“对美一边倒”战略	(3)
二、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	(8)
三、福田内阁的“共鸣外交”	(16)
四、麻生内阁的“新亚洲主义”	(18)
五、鸠山的“友爱”外交战略	(19)
第二节 21 世纪初日本对外战略的特点	(23)
一、增强外交的自主性	(23)
二、重视亚洲外交	(25)
三、积极推进联合国外交	(30)
四、淡化冷战思维	(33)

第二章 对外战略的实施路径

第一节 国家战略的实施路径之一——海洋战略 (37)

一、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37)

二、21 世纪初期的海洋立国战略 (43)

三、日本海洋战略的战略意图及对我国海洋
安全的影响 (61)

第二节 国家战略的实施路径之二

——情报大国战略 (78)

一、冷战后日本情报战略调整的背景 (79)

二、情报战略改革的措施 (94)

三、情报战略改革的目标 (104)

第三节 国家战略的实施路径之三——日美同盟 (122)

一、日美同盟的再定义 (122)

二、日美同盟的具象——日美军事一体化 (128)

第四节 对外战略的实施路径之四

——“价值观外交”战略 (138)

一、日本“价值观外交”的轨迹 (139)

二、日本“价值观外交”的特点 (150)

三、日本“价值观外交”的战略意图 (157)

第五节 对外战略的归宿——政治大国诉求 (179)

一、日本政治大国诉求与对外战略愿景 (180)

二、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前景 (190)

第三章 对华战略

第一节 中国崛起与日本的“中国威胁论”	(203)
一、日本“中国威胁论”的形成过程及基本内容	(204)
二、日本“中国威胁论”的思想文化根源	(209)
三、日本“中国威胁论”的战略意图及其危害	(214)
第二节 对华综合安保战略	(223)
一、中国与日本的结构矛盾	(223)
二、日本所构建的中美秩序类型及战略选择	(226)
三、“统合”、“平衡”、“遏制”战略	(228)
第三节 对华战略调整	(236)
一、对华战略调整的基本态势	(236)
二、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的战略调整	(247)

结 语 日本对外战略转变的动因

一、日本国家认同的变化	(261)
二、国际环境的变化	(264)
三、国内社会环境复杂化	(267)
主要参考书目	(271)

第 1 章

21世纪初日本对外战略的变奏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9·11”事件爆发,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以美苏两极对立为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日美同盟也随之进入了“漂流”期。面对以上变化,日本对对外战略进行了微调。“9·11”事件后,日本再次对国家战略进行了调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小泉当政时期。小泉执政时期,日本一直采取对美依存的外交战略,导致被亚洲各国边缘化,并且由于中日两国之间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东海油气田等问题相继出现,中日关系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

第二阶段是小泉政权结束后自民党执政时期。2006 年,自民党“鹰”派代表人物安倍晋三接替小泉出任首相后,倡导建立“自由繁荣之弧”,开展价值观外交战略。2007 年,自民党“鸽”派代表福田康夫出任首相后,提出了与小泉、安倍不同的外交战略,开展强化日美同盟与推进亚洲外交并举的“共鸣外交”战略。2008 年,麻生太郎出任首相后,打出“欧亚十字路口构想”战略。其实,麻生在三年内提出了不同的外交战略,完成了从“西方的一员”到“亚洲的一员”的国家身份认同的再定义。2006 年,时任外务大臣的麻生提出“自由繁